

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及其变化*

孙科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中韩两国有这数千年的交往，在这数千年的相互交往中，人员的相互往来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频繁的人员往来，双方都积累了大量关于对方的知识，并逐渐形成了对对方的认识。进入近代以后，中韩两国先后被迫开港，围绕着中韩的国际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韩关系也随之急剧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中韩两国国民相互认知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对方的认识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近代以来新闻媒体事业的发达，中韩两国都出现了近代的新闻媒体，这些新闻媒体为中韩两国国民的相互认知提供了更多的资讯，可以说近代以后中韩相互认知的手段、条件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更有助于双方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地认识对方。

近代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相互认知是两国或两个民族之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对两国或两个民族的关系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中韩也不例外。正因为中韩相互认知在中韩关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所以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韩两国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一课题，进行了不少相关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¹这些研究成果涉及了从古代到近代中韩两国间的相互认知，既有从宏观上论述两国相互认知的，也有从微观的角度讨论对具体事件的认识的。在这些研究成果中，虽然不少成果涉及到了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但却没有对这一课题的专门研究。有鉴于此，笔者通过对近代中国媒体的报道和近代中国人的相关著述的分析，阐述

* 近代中国媒体和相关著述对朝鲜半岛的称谓千差万别，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除引文和专有名词之外将使用韩国指称整个朝鲜半岛。

¹ 关于中韩的相互认识这一课题，中韩两国学者都曾进行了较多的研究，研究成果也相当多。韩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朴元镐等：《15~19 世纪中国人的朝鲜认识》，高句丽研究财团，2005 年；최소자：《朝·清交流系统中所呈现的中国社会：以 18 世纪朝鲜知识人的记录为中心》，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研究报告，2005 年 2 月 25 日；崔承现：《通过历史分析研究中韩相互认识》，《中国人文科学》33 辑，2006 年 8 月；서영희：《韩清通商条约以后韩中外交的实际与相互认识》，《东北亚历史论丛》第 13 号，2006 年 11 月；박동욱：《崔斗灿的〈乘차역〉中出现的韩中知识分子的相互认识》，《东亚细亚文化研究》45，2009 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孙科志：《中国人对尹奉吉事件的认识—以媒体报道为中心》，《韩国研究论丛》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 9 月；权赫秀：《近代以来中韩两国的相互认识-以黄炎培的〈朝鲜〉和李始荣的〈感时漫语〉为中心》，《社会科学论集》38，2007 年；王元周：《认识他者与反观自我-近代中国人的韩国认识》，《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孙科志：《近代中国人对韩国三一运动的认识》，《东北亚文化研究》13，2007 年 10 月；孙科志：《近代中国人对韩国独立运动的认识研究》，《东洋学志》43 辑，2008 年 5 月；孙科志：《近代中国媒体对光州学生运动的报道与认识》，《韩国独立运动史研究》35，2010 年 5 月。

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及其变化的轨迹。

既然是关于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研究，首先就需要对“国民性”这一术语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什么是国民性呢？关于国民性，近代学者梁启超曾有过如下的解释：“国民性何物？一国之人，千数百年来受诸其祖若宗，而因以自觉其卓然别成一合同而化之团体，以示异于他国民者是已”。²换句话说，国民性其实就是一国国民所具有的、区别于他国国民的国民性格或国民精神。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格或国民精神的认识。

—

近代以前，尽管中韩两国近在咫尺，但除了少数奉命出使的使节之外，一般中国人很难有机会踏上韩国的土地，近距离了解和观察韩国，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文献资料和奉命出使的使节所留下的记录，因此对韩国的认识也是模糊的，不全面的，关于韩国国民性的记述就少之更少了。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震醒了沉睡中的国人，使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但这一时期国人关注的对象是那些将坚船利炮对准中国的西方殖民者，韩国尚未进入国人的视野。同时这时的韩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即便是与具有宗藩关系的中国，虽官方使节往来无阻，但民间交往却受到很大的限制，一般中国人很难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韩国。

1876年日本借口云扬号事件迫使当时的韩国政府签订了《朝日修好条规》（又名《江华条约》一笔者），打开了韩国的大门。从此之后日本商人大批涌入韩国，从事日朝贸易，使得日韩贸易迅速发展起来，日本政府也趁机在韩国扩展势力。日本在韩势力的扩张引起了清政府警惕，也促使其改变不干涉韩国内政外交的一贯政策，开始朝加强中韩宗藩关系的方向转变，《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签订的。《章程》的签订一方面打开了两国民间交往的大门，使越来越多的中国各界人士有机会前往韩国，近距离观察韩国，观察韩国社会，为了解韩国、认识韩国获取感性的素材；另一方面，《章程》签订之后清政府即开始加强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派遣官吏驻扎韩国，介入其内政外交。这些官吏及其幕僚在韩国停留时间较长，对韩国的各方面都有所了解和观察，并大多留下了文字记录，这些记录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他们对韩国和韩国国民性的认识。

这一时期无论是在驻在韩国时间较长的官僚也好，还是那些曾到韩国作短暂停留的民间

² 梁启超：《丽韩十家文钞序》，载《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二》，版本，第？页

人士也好，其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以感性认识为主，并为经过理性的思考，且负面的认识占据了主流。1882年5月受上海轮船招商总局派遣前往韩国考察商务的吴芳伯在韩国停留近一个月，归来后先后在当时的《申报》、《益闻报》上发表了《东游记》、《游高丽王城记》、《朝鲜风土略述》、《高丽形势》等文章，后又被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³其中的《游高丽王城记》写道：

“国中士大夫及庶人皆好自修饰，被服洁整，罕有褴褛垢面者。惟性喜游惰，计一年所入可敷食用，即不复他求，盖闻该国风气，非世碌之家而饶有财货者，则官必诘究，故其民不欲聚敛，恐招怀璧之咎也。手持烟管三五成群，嬉游终日。……民俗刚直而无文，俭啬而朴陋。”⁴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看出，在吴芳伯看来，近代韩国人性格刚直，民俗朴素，但却“性喜游惰”，只要能满足衣食所需即不再有其他奢求，换句话说，近代的韩国人之满足于现实，不思进取。

这种“游惰”的性格似乎是当时中国人对近代韩国国民性的普遍认知，这从当时国人所著的韩国相关著述中也不难看出。《高丽风俗记》在谈到近代韩国人时写道：

“高丽人士大率不喜破除旧习开创新规，自安固陋而不惜，且于尊崇己国，轻视外人之意，尤断断特甚。人民大率懒惰，知有今日，不知明日，又不顾开垦土产，广启公益等事，一碗之食，一杯之酒，曲肱而枕，以为极乐世界，羲皇上人也。”⁵

同一时期的《朝鲜风土记》在描述韩国士大夫时也写道：

“士大夫夏日无事，凌晨即起，携酒榼持烟筒，游于深山峻岭，择一树林茂密处正襟危坐，逍遥自便，如羲皇上人。契友良朋聚而渐多。随举盞畅谈，娓娓不倦，凡尘世间事，若有不能移其心者。迨日落西山，始结伴旋返，远望之纷纷然。如趁墟如归市，早则不必偕往，晚则无不同归，嬉娱终日，其不务正业也可知矣。”⁶

由上面的描述不难看出，在中国人看来，“懒惰”是近代韩国人的共同性格，无论是一般贫民还是社会上层的士大夫，终日嬉娱，不务正业。这种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

³ 参见赵中孚、张存武、胡春惠等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台北，1990年。

⁴ 吴芳伯：《游高丽王城记》，载《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第552页。

⁵ 佚名：《高丽风俗记》，载《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第445页。

⁶ 佚名：《朝鲜风土记》，载《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第514页。

中国人对韩国人的一种普遍认识。1894年奉李鸿章之命率武备学堂学生考察东三省边境地区的聂士成在考察期间曾深入朝鲜内地，在42天的时间内先后考察了咸镜、平安、黄海和京畿等道，在汉城时还获得国王高宗的接待。在其撰写的有关这次考察情况的《东游纪程》中几次谈到了他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他在2月28日条写道：“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衍，不思蓄积”；在3月10日条他又写道：韩国“官民性习偷惰，恐难勤奋，可忧也”；3月27日条还写道：“因思朝鲜民间疾苦，妇女尤甚，举耕种至苦之事悉任妇女，而男子则愚惰游散”。⁷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中三次提到韩国国民“愚惰游散”，由此可见对韩国国民的这种认识在当时中国人的脑中可谓根深蒂固。

除了“性喜游惰”这种认识之外，近代韩国人拘泥于祖宗之法、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变革也是当时多数中国人对其的普遍认识。1882年作为庆军分统黄仕林的幕僚来到韩国的薛培榕曾在韩国停留较长时间，在韩期间，其“究询政事、风土，稽考地形、兵制，征搜史乘、典籍”，编著了《东藩纪要》、《朝鲜风俗记》、《朝鲜八道纪要》等。在《朝鲜风俗记》中探讨近代韩国积弱的原因时，他写道：“朝鲜之土壤非不饶沃也，物产非不丰阜也，而其国势贫弱？焉不自振者，以泥古而不知变，为成法所拘，国孱财匱有以也”。⁸也就是说，在薛培榕看来，近代韩国之所以积弱，其根本原因在于韩国君民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变革。对于近代韩国人拘泥于古法、不求变革的性格，曾深入韩国内地考察的聂士成似乎也有同感。他在自己的《东游纪程》中写道：“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⁹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近代早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知中，负面的认识占据了主流。之所以如此，有着各方面的因素，但近代中国人的姿态是造成这种认识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在中韩数千年的交往史中，朝贡关系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也是朝贡关系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因此也就必然带着有这种背景的影响。具体来说，作为天朝上国的臣民，中国人一直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韩国，其对韩认识也因而充满了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感。到了近代，随着两国先后开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机会近距离观察韩国，所能接触的韩国资讯也越来越多，影响其了解韩国、认识韩国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尽管如此，近代中国人仍然是以“俯视”的姿态来观察韩国、认识韩国，其优越感也丝毫未减。

二

⁷ 聂士成：《东游纪程》，载《近代史料笔记丛刊·〈东游纪程〉·〈日知堂笔记〉》，中华书局，2007年6月，第100、106、116页。

⁸ 薛培榕：《朝鲜风俗记》，载《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第454页。

⁹ 聂士成：《东游纪程》，同注7，第100页。

甲午战争之后，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正式承认韩国的独立，中韩之间维持两千余年的朝贡关系宣告终结，中韩两国从此成为国际法上两个平等的客体，这样就为两国人民以平等的目光重新审视对方、重新认识对方提供了契机。

19世纪中期开始，近代中国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媒体形式，这就是报纸和期刊。报纸和期刊具有时效性强、信息量大的特点，一经产生就成为国人了解时事和外部世界的重要媒体。由于从19世纪80年代起清政府开始加强与韩国的宗藩关系，韩国问题因而也成为中国朝野关注的问题之一，反映在报刊上便是关于韩国报道的增多。甲午战争之后，虽然中韩之间传统的朝贡关系宣告终结，但中国媒体对韩国事务的关注热情丝毫未减，这是因为中国媒体从不断遭到帝国主义侵略并一步步走向殖民地深渊的韩国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影子，因而持续刊载有关韩国的消息，使得中国知识人得以了解和掌握更多关于韩国的讯息。而中国知识人在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生存危机的情况下也开始惊醒，开始寻求拯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在这一过程中，正在一步步沦为殖民地的韩国就成为他们唤醒国民的一面历史之镜，开始对韩国为什么会沦为殖民地进行反思，并就此发表各种评论，探索韩国灭亡的原因，呼吁国民引以为戒。在探索韩国灭亡原因的各种评论中，不乏对韩国国民性的论述。

韩国开港早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大多属感性认识，也就是说这些认识都是相关人士在对韩国社会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得出的，缺乏理性的思考，甚至不乏偏见，因为这些人士大多是清政府的官员，往往是以“天朝上国”臣民的姿态俯视韩国国民和韩国社会。与此不同的是，甲午战争失败给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冲击，而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这促使中国有识之士不得不开始思考自己国家和民族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怎样才能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等问题。在思考的过程中，韩国沦为殖民地的过程无疑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希望能通过对韩国王国原因的探讨来唤醒国人，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知识人开始探讨韩国国民在亡国过程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了新的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讨论韩国国民性的中国人大部分并没有直接观察韩国的经历，他们大多是研究、分析新闻媒体所载资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认识的，因此这种认识更具理性的思考。

这一时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是在探索韩国亡国原因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也不乏一些感性认识，大部分都是经过理性思考的。不仅如此，虽然也有从整体上认识韩国国民性的，但是更多的是将韩国国民划分为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来认识的。

在韩国亡国前夕就有中国人指出，韩国之所以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

“廷臣贪贿，国民虚矫，农工商务无一不废”。¹⁰与前期一样，韩国国民“怠惰”、“喜欢闲谈”的这种性格仍然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人最喜谈，三人相遇，辄喋喋终日，而外人稍知朝鲜人性格者，谓其所言固一由衷也。”不仅一般国民这样，甚至负责国家政务的官僚也是如此。“见有巍巍广厦若干所耸立汉城中，大榜於门曰某部某部，而其中乃无一文牍，大臣会议则惟围坐一桌，菸气弥漫，游谈无根，无一语及政务也。”¹¹这种终日清谈、不务政事在中国人看来是导致韩国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韩国人未来观念淡薄、缺乏长远眼光的性格同样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人看来，“朝鲜人对于将来之观念甚薄弱，小民但得一饱，则相与三三两两，煮茗憩树荫，清谈终日，不复计明日从何得食，悠然若羲皇上人也，其宦达者亦然”。¹²韩国国民这种只顾眼前不思长远的性格使得他们在近代资本主义的狂潮中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潜在危险视而不见，未能未雨绸缪，奋起自救，故“亡韩者韩也！非日本也，使韩之君臣能鉴於世界风潮之恶，早图自存，则虽有百日本，亦畴得而侮之者”。¹³

这一时期中国人开始对韩国国民的构成及其性格上来探索韩国亡国的原因，对于统治韩国社会长达数百年的两班阶层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一文中就指出：“所谓两班者，国中政治上社会上生计上之势力，咸为所垄断，非两班则不得为官吏，非两班则不得从事学业，非两班则私有财产不能安固。质言之，则朝鲜国中有自由意志有独立人格者，惟两班而已……，彼其两班之人，皆养尊处优，骄佚而不事事，以作官为唯一之职业，故他国之设官，以治国务，朝鲜之设官，则以养无业之人。”¹⁴可见，在梁启超看来，韩国两班阶层垄断了韩国社会的所有财富和资源，但却并不为治理国家而着想。不仅如此，两班阶层“虽穿衣吃饭，亦几于不能自了，其四肢五官，皆久已弃塞不用，失其本能。仅能借他人之耳目手足，以为己视听言动之助”，¹⁵完全成了一个寄食阶层。他们非但不能治理国家造福国民，甚至结党拉派，为一己之私而置国家百姓与不顾。“故朝鲜最多朋党而好为阴谋（我国何如），百年以前，即有所谓南宗、北宗、老论、少论诸派者，以依附排挤为事，至晚近而益盛，而其所谓党派者又非有一共同目的也，各借党以营私利而已，故朝握手而夕操戈，不以为怪”，¹⁶故“凡在政界上的人就知道分党派，争权利，一举一动，无非是找他

¹⁰ 《哀亡韩》，《大公报》（天津）1910年7月23日。

¹¹ 《朝鲜灭亡之原因（四）》，《时报》（上海）1910年9月3日。

¹² 同上。

¹³ 《殷鉴篇其一》，《桂林南报》第2期，1911年1月。

¹⁴ 梁启超：《朝鲜灭亡之原因》，赵中孚等编：《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台北，1990，第266至267页。

¹⁵ 梁启超：《朝鲜贵族之将来》，前引《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第239页。

¹⁶ 《朝鲜灭亡之原因（三）》，《时报》（上海）1910年9月1日。

们自己一身的功名富贵罢了。”¹⁷甚至有中国人称韩国亡国归根结底是韩国统治阶层“内部党政之结果”。¹⁸

这一时期中国人借用唐代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提出的“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这一名句，指出“亡韩者韩也，非日本也”，从韩国内部探索韩国灭亡的原因。在分析韩国国民结构之后，对作为统治阶层的两班贵族进行了无情地批判，同时对作为被统治阶层的一般国民麻木的精神状态也进行了批判，称“那作人民的，也是不能脱奴隶的性质，也不知道什么爱国，什么灭亡，……，全国如同在梦里一样”。¹⁹在中国人看来，正是由于统治阶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整日为了一己之私党争不断，一般国民终日碌碌无为，精神麻木，才最终导致了韩国亡国。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仍以负面性的内容占主流，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通过探索韩国灭亡的原因来进行自我反思，因此在指出韩国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是也在反问中国是否也存在着同样或类似的问题。《时报》所载《朝鲜灭亡之原因（三）》一文在分析韩国灭亡原因时，每列出一个韩国存在的问题就会以“我国何如？”进行反身自问。²⁰同时中国人原有的那种“俯视”韩国和韩国国民的优越感也逐渐减少，因为毕竟中韩两国传统的宗藩关系已经结束，两国成了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内两个平等的客体。

三

随着韩国国内局势的变化，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开始逐渐发生变化，促使这种变化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显现出来的爱国和争取自主独立活动的理解。

虽然近代中国人曾认为韩国国民不知道什么是爱国，但韩国国民在《己巳保护条约》签订后的种种表现令中国人惊讶不已，也开始重新认识韩国的国民性。当时上海《东方杂志》在《韩国灭亡史》一文中对《己巳保护条约》签订当天汉城²¹民众做了非常详细的描述：

“当日京城内外官民男女老少，始闻该约调印，痛哭流涕者，不知其数，在野元老大臣赵秉世，亦闻报入京，率百官庭请弹劾调印之诸大臣，通牒各国公使，破裂新约，日

¹⁷ 《说朝鲜》，《大公报》（天津）1912年6月13日。

¹⁸ 《对于日韩合邦论之批判》，《大公报》（天津）1910年7月23日。

¹⁹ 《说朝鲜》，《大公报》（天津）1912年6月13日。

²⁰ 参见：《朝鲜灭亡之原因》，《时报》（上海）1910年9月1日。

²¹ 本文仍使用当时韩国首都的旧名“汉城”。

本宪兵拘之去，赵因自致命。闵泳焕继续庭请，亦被日兵所迫以致殒命。闵泳焕母徐氏，年八十，忽闻报，气塞自尽。侍郎洪晚植痛哭而死。各省儒生数千名，请以调印诸大臣，亟正邦刑，破裂新约事，叩阍上陈，经日宪兵捕缚四十余人。其他学校生徒八百余人，极力反对新约，演说於次道，亦被日兵捕缚。耶稣教徒中青年会员数十名，初次陈疏，力抗日本之无理行为，又被日宪兵巡查所捕，宫门之前，流血满地。其翌日青年会员四百余人，会集京城大道，大呼大韩帝国独立万岁，并哭责日本之妄状……。”²²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在《己巳保护条约》签订这一天，韩国国民从朝廷大臣到一般百姓，从学校学生到宗教教徒都对此表示反对，还呼出了“大韩独立万岁”的口号，这绝对是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人所始料未及的。对于这种情形，梁启超曾评价道：“此区区敌忾之心，其终必无救于亡韩，又稍达时局者所能预断也。”²³也就是说，《己巳保护条约》签订之后韩国国民所表现出的这种同仇敌忾的精神，虽然未必能拯救国家于未亡，但还是彰显了韩国国民的自主独立精神。

1910年日本强迫韩国签订《韩日合邦条约》后韩国国民的种种爱国行动更是令中国人惊讶不已。

《韩日合邦条约》签订之后，“全罗北道金山郡守洪范植，前晚缢死，盖愤日韩合并事也”，²⁴“地方农氓，侨外商工，亦复有毁家献身谋光复者”。²⁵总部设在旧金山的高丽爱国会总事务所“今闻日韩合并，开会议决，不肯弃让主权，并拟用强暴手段，以去日法，末言我等之韩国子民，决不肯甘心苟安，而不争自由独立”。²⁶甚至就连“留日韩学生悲愤自杀者约五、十人，有以刀割腹而死者，有以手枪自击死者，有饮毒药而死者，惨不忍闻”。²⁷日本吞并韩国之后，韩国国民或以身殉国，或奋起反抗，这给近代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不由发出惊呼：“噫！韩国人尚知有自由独立四字耶！自并合後，只闻悬灯升旗以相庆贺，未闻鸣钟倡议反正者”，²⁸作为中国人对此不禁“哀其志而悲其遇”，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随之改变。

在日本吞并韩国之前的1909年12月26日，安重根在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伊藤博文，这

²² 《朝鲜灭亡史》，《东方杂志》第3卷第3期，1906年3月25日。

²³ 梁启超：《朝鲜亡国史略》，前引《近代中韩关系史资料汇编》第12册，第257页

²⁴ 《朝鲜亡国之尾声》，《桂林南报》第2期，1911年1月。

²⁵ 梁启超：《朝鲜灭亡惨史》，醒社，出版年月不详，第52页。

²⁶ 前引《朝鲜亡国之尾声》。

²⁷ 《可怜亡国之学生》，《申报》（上海）1910年9月1日。

²⁸ 前引《朝鲜亡国之尾声》。

在中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媒体也纷纷报道和评论。虽然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最初的评论多时将此视作安重根个人的行动，并没有将其与韩国国民或韩民族联系起来，这由当时中国人对此评论中就不难看出。1910年9月上海《时报》刊载的《朝鲜灭亡之原因（四）》就此评论道：²⁹

“夫以朝鲜一千万人中，若安重根其人者亦未始无一二，吾岂敢一律蔑视，虽然，此种人固亿万中不得一二，即有一二焉，而亦不见重于社会，匪惟不见重，且不能以自生存，盖朝鲜社会，阴险无耻者常居优胜之数，而贞洁自爱者常居劣败之数，其人之为恶，殆非必出自天性，而强半由社会现象迫之使然也”。

可以看出，韩国社会不但没有众多的“安重根”，“亿万中不得一二”，而且在韩国社会像安重根这种人是很难立足的。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并没有把安重根的英雄事迹过多地与韩国国民或韩民族联系起来，真正促使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发生转变的契机还是《己巳保护条约》和《韩日合邦条约》后众多韩国一般国民为求光复而不惜“献身毁家”的惨烈壮举。

促使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发生彻底改变的是1919年三一运动及其之后为求独立自主而展开的独立运动。

1919年3月1日，韩国爆发了全民族的反日独立运动。三一运动爆发后，中国媒体对三一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连篇累牍地报道了韩国民众在三一运动中为争取独立自由而展开的斗争。中国各界人士在通过媒体了解这些情况之后也纷纷发表评论，对韩国民众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给予很高评价。

首先，通过三一运动韩国民众的爱国精神得到了近代中国人的肯定。在近代早期，中国人认为韩国人“不知爱国为何物”，但是在经历了亡国的苦痛之后，面对强大的敌人，韩国民众也深知“这次朝鲜的独立，就外表论来，力量是很薄弱的，成功是丝毫没有的”。³⁰尽管如此，韩国人民仍然奋勇而起，“知其不可而为之”，重现显示出了韩国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

其次，韩国民众在三一运动中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也为近代国人敬佩不已。“凡自动的革命，必是那个民族有建国的能力，独立的精神，为爱自由而流血，因争自治而牺牲。

²⁹ 前引《朝鲜灭亡之原因（四）》。

³⁰ 孟真：《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晨报》1919年3月20日。

这回朝鲜革命，就含有这种精神，所以令人佩服”。³¹傅斯年在评论中称韩国民众的这种精神“实在可以算得‘开革命界之新纪元’”，并说“我们应当高呼‘朝鲜独立运动的精神万岁’”。甚至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只要“朝鲜的独立未成，这种精神自必继续下去”，³²“有这种独立精神的民族，必不会永久仰他人鼻息的。朝鲜脱离日本的羁绊，直指故间事，我们拭目以观其成就是了”。³³

由此可见，三一运动之后，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发生了彻底的改观，韩国民众爱国、热爱独立与自由、为达目的不屈不挠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主流认识，这从 1932 年曾游历韩国的马毅在《朝鲜纪游》一文中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文中写道：³⁴

“我觉得朝鲜是伟大的。倒不只是因为安重根，尹奉吉。他们亡了三十年，一切生存的权利自由幸福都被剥夺净尽，在整个的压迫之下，国际间也毫无援助，他们没有革命的机会与武器，他们整个是被统治者，可是他们依然奋斗，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说过‘朝鲜没办法了’！”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改变对中国形成同情和支持韩国独立运动的社会舆论、中韩两民族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结成联合战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语

近代以来，随着中韩两国先后开港和中韩之间宗藩关系的加强，前往韩国的中国人士特别是民间人士越来越多，对韩国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而报纸和杂志等近代媒体的产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随着对韩国了解的加深，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从以上国臣民的姿态俯视韩国国民到痛批韩国统治阶层的种种病态再到对韩国国民追求独立自主的精神表达由衷的敬佩，完成了从鄙视到否定、从否定到肯定的转变。近代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这种认识的转变有着多种多样的因素。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转变与中韩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韩开港之后，面对西方殖民者和日本的侵略，中韩之间传统的宗藩关系出现了加强的趋势。尽管如此，中韩之间的传统关系最终还是被打破，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正式承认了韩国的独立，1899

³¹ 若愚：《朝鲜革命与外蒙骚乱》，《晨报》1919年3月27日。

³² 前引孟真：《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

³³ 穗庭：《朝鲜独立运动感言》，《新潮》第1卷第4号，1919年4月。

³⁴ 马毅：《朝鲜纪游》，《东北月刊》第1卷第2期，1932年6月。

年与韩国签订了《清韩通商条约》，从此中韩成为近代国际关系体制内的两个平等的客体。随着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国的侵略，韩国一步步沦落为日本的保护国和殖民地。韩国这种地位的变化也使中韩关系发生了变化，尽管双方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两国同作为被压迫民族的一员相互联合的意识增强，并最终形成了中韩抗日联合战线。伴随着近代中韩关系的这种演变，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转变与中国国内局势的变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不断面临外来侵略，特别是甲午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国人开始思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对自身进行反省。而在这一过程中，曾与中国有着密切关系的韩国无疑成为中国人引以为鉴的例子，他们通过对韩国亡国原因的探悉来进行自身的反省。随着中国反日革命运动的开展，同样受到日本侵略、同样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韩国再次成为中国人关注的对象，对韩国国民性的了解和认识也随之加深。

中国人对韩国国民性认识的转变与韩国国内局势和韩国民众反日独立运动也有着紧密的关系。进入近代以后，韩国不断遭到日本的殖民侵略。面对日本的侵略，韩国各阶层也曾试图通过实现自强来抵御这种侵略，但却没有形成一种合力。直到日本将韩国变为自己的保护国才开始唤醒了韩国民众，从此韩国民众开始了广泛了反日独立运动，无论是《己巳条约》和《韩日合邦条约》签订前后韩国民众不惜“献身毁家”的惨烈壮举还是三一运动中表现出的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都给中国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也促使中国人逐步改变了对韩国国民性的认识。